



【元来如此】
比照民营企业来确定国企领导人的收入水平,是一种“帕累托改善”。



【庙堂江湖】
应容许民资和外资介入教育领域,各施所长,从而淘汰掉那些没有能力的公立大学,让优秀的大学脱颖而出。



【儒林经济】
官场上的冷暖可见一斑,风光时貌似交下好多人,其实一个都靠不住。



【南腔晋调】
做什么事,其实并不只是专业技术,比如单纯的打打杀杀,更重要的是对人情世态的体察。

从帕累托改善看国企高管收入

肖国元

近日,《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和《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等两个重要文件的出台,引发了关于国企领导人收入与职务消费的大讨论。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厘清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根本区别,不能将民营企业的收入分配机制拿来作为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的比照对象。”“因为民营企业老总是以他们私人所有的资产在市场上经营,而国企的资产却是国有资产,国企负责人管理一个国企,从本质上来说也是接受了民众的委托,并不意味着这个国企成了他的

私人财产。”按照这种看法,国企领导人的收入应该与公务员类似。

假如国企领导人的收入比照同级公务员确定,那么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国企将找不到合适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或者,即使找到了,也必然会大量涌现“59岁现象”——国企领导人在行将退休离职之际,想办法捞一把,以弥补企业对自己的“亏欠”。这样的事情,我们过去难道还见得少吗?

客观而言,国企的“比照”不是什么新鲜事,是长期试错的结果。相对于民企的市场化抉择,这样做虽然不算完满,也算是一种次优选择。理论上,跳出公务员工资待遇的框架约束,引进包括“职务消费”在内的待遇机制,或者更大胆一些,比照民营企业来确定国企领导人的收入水平,是一种“帕

累托改善”——在不损害第三方利益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激励机制,让企业领导人为国企贡献更多的利润。

国企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长期来一直扮演着主宰国家经济命脉的角色而被纳入行政管理体系。在改革开放之前,国企职工,包括企业领导人的工资待遇是比照政府职员系列决定的。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时代,国企领导人的待遇也算优渥,职工的“铁饭碗”不知迷倒多少人。然而,自引进市场机制的改革开启以后,市场经济显现出来的魔力将国企置于尴尬之地。面对激烈的市场经济的竞争,可行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将国企私有化;二是比照市场化的民企确定员工,包括企业领导人的工资福利待遇。因此,国企领导人的收入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

而是一个老难题了。可以说,这个难题自市场经济改革以来就存在,至今也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

事实上,在国企中,要确定一个合理的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并不容易,往往面临两难选择:定高了,会出现浪费现象;定低了,找不到恰当的人选。其原因就在于缺乏客观公开公正的选拔机制,或者说至少缺乏一个有效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退而求其次,采用“比照”的做法。至于工资报酬之外的职务消费,原本就具有补偿的性质,是调节国企领导人待遇的另类阀门。只不过由于企业差别太大,无法统一待遇口径,才放手让企业自行个别确定,才出现了不同国企领导人之间职务消费的天壤之别以及一天可以高达四万元职务消费的怪

现象,从而引来民众诟病。

不过,即使有了职业经理人市场,也不能保证这样确定的工资待遇及职务消费就是可接受的,更不能保证民众不埋怨。原因在于这样的定价与估算太主观、太复杂、弹性太大了。

因此,虽然按照上述两个文件的规定,对央企领导人的薪酬待遇与职务消费做出明确规定也许是可行的,毕竟能划进这个圈子的央企只有百十来家,但是,对于剩下的,包括地方国企在内的成千上万家国企,如果也照此一并施行,估计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要想较好解决这个问题,可行的办法莫过于对庞大的国企队伍削藩瘦身,实行市场化改革,让市场来决定其职业经理人选以及与之相配的工资福利待遇。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一流大学的出现靠竞争而非靠打造

沈凌

中国领导人早就提出用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但中国的大学一直难跻身世界一流。这个矛盾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而越来越凸显,因为经济增长源泉在慢慢地从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到自我创新驱动。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能够从容改进大学教育科研体制?

现在很多人都在诟病中国大学,矛头所指,几乎都是大学的行政官僚体制问题,并认为这样的体制阻碍着中国大学研究水平的提高。这固然没错,但是如何改革呢?几乎所有的批评者,又都翘首期待着顶层设计,并迫不及待地希望能够集中全国的力量“打

造”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其实,顶层设计的重点,并非是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而是一个“教育市场”的游戏规则,从而使得这个游戏规则内的“市场主体”(大学)优胜劣汰,自我改善其管理制度。这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经验,它同样可以被复制到教育领域。很多人出于这样那样的动机,否定高等教育领域的市场机制,关闭民资外资进入教育领域的大门。但是即便政府继续闭关锁国教育,也不见得中国的老百姓就会乖乖地呆在国内接受官办教育。

现在,中国每年出国留学的人数已达50万,相当于高考人数的5%~6%,而且每年还增长20%以上,他们都是市场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或是

最聪明的学生,或是最有钱的家长)。加上未来总升学人数会逐步下降,估计再过十年,我们的教育市场就会被外国大学占领三分之一。这绝非危言耸听。学生出国留学相当于我们进口国外大学,这说明:即便政府没有对外资民资全面开放教育领域,但市场仍然能够顽强纠正管制的结果,尽管代价高昂。面对全球化的教育领域,我们政府还能够继续闭关锁国吗?

当然,即便开放了教育领域的投资来源,公立大学仍有存在的必要,这是教育的公平性使然。那么如何才能在中国把公共财政资源有效率地配置到高等教育领域呢?简而言之,我们是继续维护一枝(或几枝)独大的垄断局面呢?还是花力量培养更多的能够和

北大清华形成有效竞争的多所大学呢?在这点上,德国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可以说,德国的国立大学之所以还能够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和它比较平均的大学教学科研水平以及由此产生的彼此竞争是分不开的。

过去我们的思路是:为赶超超美,可以把全部的资源配给某一个大学,让其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打造出世界一流大学”。这其实和计划经济一脉相承,并不新鲜。经济领域的实践一再证明,垄断的行业往往创新是最少的。竞争才能够推动市场主体不断地创新。被行业禁入保护了的那些国有企业,比如中国铁路、两大油企和三大电信巨头,无一不是中国最没有效率的企业。教育也是一样,一流大学如果可

以被政府打造出来,那么全世界最厉害的国家应该是前苏联。

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告诉我们:不是说面对竞争,原来短脖子的鹿,会拼命拉伸脖子,最后短颈鹿变成了长颈鹿;而是原来就有不同长短脖子的鹿,彼此竞争,使得长脖子的鹿生存下来,短脖子的鹿被淘汰掉了。政府不可能让一个个原来没有创新力的公立大学通过管理机制的革新,摇身一变而成为最具创新力的世界一流大学。但是政府能够通过容纳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介入教育领域,各施所长,从而淘汰掉那些没有能力的公立大学,让优秀的大学脱颖而出,如此优胜劣汰良性循环下去,一流大学终将诞生。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古代贪官也是战战兢兢

王国华

读《儒林外史》,发现古时候的官员与现在有许多类似。比如,都带着必然贪污的原罪,都是常常在污名和争议中获得升迁,又都随时可能会被查处。他们的一生,是竭尽全力往上爬的一生,是作威作福的一生,更是战战兢兢的一生。

来看几个例子。向鼎,先是做安东县知县,后因断案草率被弹劾,幸亏监察官身边的戏子鲍文卿是他的崇拜者,帮他躲过一劫。向知县随后荣升安庆知府,再以后迁升福建汀漳道台。有一天晚上,向知府家门口忽然来了一班人马,府院的一位差官打前站,后面紧跟着一位“二府”(即省衙的二把手),大声叫向太爷出来。满衙门的人都发起慌来,连说,不好了,来捕印

了!向知府听说捕印官来,赶忙把手下的刑名、钱谷诸位主管叫到跟前说,诸位先生将房里各样文案都查点查点,务必要查细些,不可遗漏了事。说罢开了宅门匆匆出去。只见那位二府拿出一张牌票来给他看了看,附耳低语几句,上轿走了。向知府回屋后跟亲戚们说,没什么事,是宁国府知府出事了,上级派我去摘他的印。

来分析一下。其一,向知府预感到不妙,第一时间召集手下“查点查点”,“不可遗漏了事”,此乃与同案犯串供、消除赃证。不用他细说,其他人都心知肚明。可见平时多有不轨。其二,上级官员突然造访,满府的人马上联想到是来摘印而不是打赏,可证被摘印已在所有人预料之中。原罪太多,或许不知犯的哪一件,但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自危已成常态。有个现代笑

话,领导班子正在开会,纪委的人突然推门进来,在座所有人都傻了。等纪委同志叫出一个人的名字,其他人才擦擦头上的汗,长舒一口气。向知府处境和思维与此类似。

该书书中还有一个时隐时现的人物——苟枚。他本是老儒生周进教的一个幼童,后来周进官运亨通,连带着让苟枚也进了学,提拔起来,书中讲到他母亲去世,回家丁忧之后再无此人正面故事。再出现时,是骗子牛玉圃到盐商万雪斋家中做客,见到万家厅堂中间悬着一个匾,上面三个金色大字:“慎思堂”,旁边一行“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苟枚书”,可见当初可爱的小幼童此时已经成了身在肥缺,掌握实权的官员,并且同商人打得火热。又一次出现,是在浪荡公子季苇萧嘴里。有人问季苇萧的钱是哪里来的,答曰,我一到

扬州,苟年伯就送了我一百二十两银子,又让我在瓜洲管关税,接下来还要在这里过几年,所以又娶一个亲……季苇萧的老爹是个武举人,候选守备。由此可见苟某在官场上交往甚多,方方面面的人都会照顾到。

再接下来就有点意思了。在一个社交场合,有人问混子文人金东崖为什么到江南来,金东崖自称家里出了点事儿,因为和盐运司苟老先生是京师旧交,特到扬州来看望他一下,承蒙他关照,给他推荐了一个肥差,还送了几百两银子。从金东崖的话可证苟枚念旧,会把手头利益与更多的人分享。一是雷横不知情,不用卖这个人情;二是雷横有个坏习惯,如果露财去赌,坏了大事。

第五能:晓轻重缓急。送别刘唐时,宋江说:“贤弟,我不敢留你相请去家中住,倘或有人认得时,不是要处。”确实,这可不是开玩笑啊,不是我讲人情不留你住宿,实在是形势太凶险。宋江又交代:“今夜月色必然明朗,你便可回山寨去,莫在此耽搁。宋江再三中意众头领,不能前来庆贺,切乞恕罪。”宋江在此再次表明,刘唐的安危要紧,再次表达对梁山兄弟的谢意。

向:“原来如此。可见旦夕祸福!”马上转入了下一个话题。按金东崖刚才的叙述,他实打实地受过苟枚大恩,不该这么冷淡,说他全无心肝也不一定,他内心里可能也泛起了波澜,但趋利避害的本能让他不愿与犯了事的人再发生牵连。可以预见的是,他事后也不会为苟枚做什么,甚至不可能去牢狱里探望。官场上的冷暖可见一斑,风光时貌似交下好多人,其实一个都靠不住。

从向鼎到苟枚,个个都耀武扬威过,个个又都如待宰的羔羊。说他们个人的悲剧来源于制度之恶应该没错。现在有些人一提制度之恶就厌倦,认为制度终究是人制定的,所有人都是无法开脱的同谋。其实不然,制度是所有人参与制定的,还是一小部分人制定的,这里有很大区别。

(作者系深圳作家)

宋江对人情世故的透视

晋东南

施耐庵的古典诗词功力甚高,放在今天,获个鲁迅文学奖提名应该没有问题的。他有一首《临江仙》是赞宋江的:“起自花村刀笔吏,英灵上应天星。疏财仗义更多能。事亲行孝敬,待士有声名。济弱扶倾心慷慨,高名冰月双清。及时甘雨四方称。山东呼保义,豪杰宋公明。”

如果不深入了解的话,宋江似乎是个不起眼的人物。论相貌身材,是个黑脸,身材又矮,被称为黑宋江;论身份,不过是做押司的小吏。此般人物,如何能够在山东、河北闻名,被称作及时雨,后来又做了梁山的老大并成就一番造反事业?其中必有缘由。成龙有首歌《真心英雄》里说: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宋江也不例外,《水浒传》第

十八回里这一首词把宋江的优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总结,从中可窥见其成功之处。

在这首词之前,施耐庵先用一段铺排描述了宋江,不外乎“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之类粗线条的语言。至于框架之下的细部描写,更是举目皆是,因宋江是重点人物,书中但凡涉及宋江的描写,出不了《临江仙》里的总结性概念:仗义疏财更多能。试举一例,于《水浒传》第二十四《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他与刘唐的一番话,可管中窥豹,领略宋江的为人处世之法,领略他的“更多能”。

第一能:心中有大局。书中说:看看天色晚了,刘唐吃了酒,把桌上金子包打开,要取出来。宋江慌忙拦住:“贤弟,你听我说:你们七个弟兄,初到山

寨,正要金銀使用。”可见,宋江首要考虑的是山寨的发展,而不是见钱眼开,图一己之私利。

第二能:办事有根据。他说:“宋江家中颇有些过活,且放在你山寨,等宋江家缺少盘缠时,却教兄弟宋清来取。”不过是几句话,却推辞的有情有据,同时也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有需要的时候我再来拿。

第三能:办事很周全。宋江说:“今日非是宋江见外,于内受了一条。”这就是说,我宋江已经领情了,也好对梁山有个交代。

第四能:颇了解同僚。对于朱全,宋江说:“朱全那人也有些家私,不用与他,我自与他说知人情便了。”可见宋江对朱全的经济很了解,再给他送钱就没必要了,他也用不着,并向刘唐保证,会转达梁山对他的谢意。对

于雷横,宋江说:“这人,又不知我报与保正。况兼这人贪贿,倘或将些出去赌时,他便惹出事来,不当稳便,金子切不可与他。”在这里,宋江认为不能给雷横财物,并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是雷横不知情,不用卖这个人情;二是雷横有个坏习惯,如果露财去赌,坏了大事。

第五能:晓轻重缓急。送别刘唐时,宋江说:“贤弟,我不敢留你相请去家中住,倘或有人认得时,不是要处。”确实,这可不是开玩笑啊,不是我讲人情不留你住宿,实在是形势太凶险。宋江又交代:“今夜月色必然明朗,你便可回山寨去,莫在此耽搁。宋江再三中意众头领,不能前来庆贺,切乞恕罪。”宋江在此再次表明,刘唐的安危要紧,再次表达对梁山兄弟的谢意。

短短一段话,蕴含了宋江的很多生活道理,方方面面都很妥帖。做什么事,其实并不只是专业技术,比如单纯的打打杀杀,更重要的是对人情世态的体察,对社会的深入洞察,对朋友的知根知底,这样,所走的每一步才能做到处处有理。

说点题外话。如果一部小说中的对话有八成达到了宋江这段话的水平,基本上可以把人物写活了。恭喜你!你已经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了。人造出来的语言是干巴巴的,能入木三分刻画出入物来的语言才是好语言。这一点,《水浒传》做到了。

仅凭这一段话就可以断定:宋江这个人仗义疏财,但他并不是瞎花钱,而是建立在对人情世态的高度透视之上的。

(作者系深圳文化学者)